

# 對倒的時空

## ——劉以鬯與他的文學世界

西 柚

### 第一章 引子：與歲月言和

那些消逝的歲月，彷彿隔 一塊積 灰塵的  
玻璃，看得到、抓不 。他一直在懷念 過去的一  
切。如果他能衝破那塊積 灰塵的玻璃，他會  
走回已消逝的歲月。

——劉以鬯《對倒》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一日，香港文化中心隆重舉  
行電影《花樣年華》首演式。

香港特首和政要名流在無數閃光燈的簇擁下登  
上那鋪着紅地毯的台階，進入放映大廳。

劉以鬯和太太避開紅地毯，靜靜地從另外一條  
樓梯走入戲院。

光影在劇院中變換，流逝……畫面最終靜止在  
桃紅的背景色下，銀幕上出現一行醒目的白字：特  
別鳴謝劉以鬯先生。

於是，電影《花樣年華》讓世人的視線聚焦於  
劉以鬯的小說《對倒》；聚焦於劉以鬯這個見證於

香港文學並參與創造香港文學的八十三歲的老作家  
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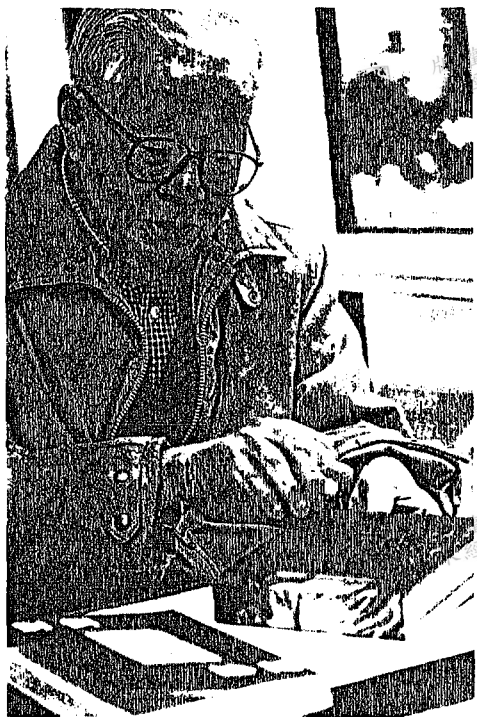
……

初識劉以鬯先生的大名還是在八十年代初，中  
國剛剛從愚昧中甦醒，文藝從荒蕪裡萌發片片綠  
芽，一篇《打錯了》的極短篇小說，讓國人震驚。  
那時間的差之分厘卻失之於千里，導致人生截然不  
同的命運，歲月的偶然彰顯出生命的無常。冥冥  
中，命運彷彿是一只無形的手，那麼隨意那麼偶然  
地安排人的一生。

歲月是什麼？是兒童的歡笑？是老人黃昏下的  
背影？是溫軟如玉的女孩？還是陌路相逢的漠然？

今天，有幸將劉以鬯先生的大部分作品，如  
《酒徒》、《對倒》、《陶瓷》、《寺內》等以及眾  
多評論家及他筆下的文字給文學世界和現實中的人  
生究竟帶來多少思想上的衝擊和深遠影響加以評論  
時，視線不知為什麼竟被歲月的煙塵所籠罩……

劉以鬯先生的世界是龐大無邊的。在香港文壇  
活躍了逾半個世紀的劉以鬯，他的作品，帶有香港



《對倒》與《對倒》寫真集

文學的里程碑性質，因為他的作品中「蘊含着兩股激流，一股與時代的運動相融合，另一股則潛藏得更深沉，超越了那個時代的思想願望與需要，是穿透時空的，一直到現代，它還滋養着新的時代。」（見《論東方詩化意識流小說》導論，周偉民、唐玲玲著，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第一版）

然而，歲月是公正的嗎？它所呈現的紛紜和倒錯，呈現出的光明與黑暗、美與醜也只有走過那些彌漫着辛酸和歡笑，浸淫着苦與樂的日子的劉以鬯才能在平淡、恬靜中不溫不火地說：「三十年，也不算太短的日子了。」

三十年前劉以鬯在做什麼？為了生計，他除了做副刊編輯、寫七八個專欄之外，念念不忘的是他對文學的探索。在那一年裡，他從獲得的一枚對倒郵票上產生了靈感，寫成了三十年後名震遐邇的小說《對倒》！三十年或者說是一百年吧，一枚小小的郵票竟然演繹出如此奇妙的人間故事，真是讓人感懷不已；而流走於劉以鬯先生身邊的如煙往事卻

以「對倒」真實本質，呈現在現代今天人們的面前。

說什麼好呢？難道命定的緣份真的是那張小小的郵票嗎？

是百多年前發生的事情了，中國郵政尚在萌芽狀態，那時的朝代是滿清王朝，在鴻雁翻飛中，一枚「對倒」郵票「慈壽九分銀」，在夜空中帶着閨閣中一個女子的溫情，抑或是早已鬢髮斑白的老父的叮嚀，從遙遠的東方古國，隨着以武力強行進入那片古老大地海域的某個港口，或是廈門，或是青島，也許就是香港吧！那時的香港才被英國人佔領不久吧，反正它帶着親人的手溫，它隨着絲綢、瓷器的火輪，飄飄地來到了另一個國度……

七十八年後。一九七二年，倫敦吉本斯公司舉行華郵拍賣，「慈壽九分銀對倒票」也在其中。在眾多競投的集郵愛好者中，劉以鬯以書信方式投得這枚「慈壽九分銀對倒郵票」。

獲得了這枚郵票珍品，五十四歲的劉以鬯高興得用放大鏡欣賞。這枚郵票珍品是俗稱「慈壽」、「萬壽」的紀念郵票。它發行於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清光緒二十年十月），紀念慈禧太後六十壽辰，是中國海關郵政的「關門票」，又是大清郵政的加字改值的票基。該票由上海海關造冊處郵票設計員德國人費拉爾（舊譯棟維拉德 De Villard）設計，全套九枚（六枚小型，三枚大型），太極圖水印，石版印刷。這套郵票雖距一八四〇年黑便士誕生逾半個世紀，但其在世界人物紀念郵票系列中向以難以收集、更難以研究而著稱。

此套郵票由三種版別和六套加字改值票組成，「萬壽群體」不下一百餘種。萬壽票第一版有著名的變體票，即九分銀全版（六枚），左下角均有一子模倒置而與右與上形成橫雙連對倒和直雙連對倒。公認系繪圖兼督印的費拉爾所作的手腳，直到邇今

此公此舉仍受盡斥責。其實罵歸罵，趨之若鶩者仍以覓到此票為榮，況且此類對倒連票，萬壽九分對倒既非空前（法國第一套谷物女神西雷斯就有對倒一組），亦非絕後（解放區江淮特區郵票中就有毛澤東、朱德第三枚對倒連票）。一百多年時光流逝，在新世紀初，這幅郵票珍品的收藏者、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感懷道：

「假如把兩個郵票撕開來，就變成一點意思都沒有，因為它作為對倒這一條線一定要粘在一起，假如撕下來，這個郵票就不是對倒了。換句話說，它們本來也不是有什麼關係，大家同是一張郵票，好像我們人一樣，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們在馬路上面走來走去，無所謂你我，可是它因為有這麼一個聯繫在一起，就變成比較特別的關係了。

由此，他想到了人與人之間：「人那麼多，市民那麼多，不可能每個人都認識，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即使不認識，之間也是有關係的。比如今天我住的這個房子，我從來就不知道當時建築這個房子的工人是長怎樣的，現在是不是還在，可是事實上我在這個房子住了這麼久，這些東西都是他親手弄上去的，那麼換句話說，這個社會上兩個完全不認識的人，之間也是有一種關係的。有時他們見到的社會景象可能會一樣。」

於是，一部題名為《對倒》的小說誕生。歲月如駒，二〇〇〇年，導演王家衛從小說《對倒》中取得靈感，拍成了轟動一時的《花樣年華》，電影距一九七二年投得「慈壽九分銀對倒郵票」已有近三十年。三十年後，二〇〇一年六月，新加坡《聯合早報》香港特派員李慧玲採訪了這位已是八十三歲的競投獲得者，他用回憶的口吻敘述了當年的心情。

引起媒體對老人興趣的起點不是《對倒》本身，而是那部在康城影展中得獎的電影《花樣年



劉以鬯獲授勳銜後攝於禮賓府花園

華》。因為著名導演王家衛在《花樣年華》的末尾特別鳴謝劉以鬯先生。

在《對倒寫真集》前言中，王家衛解釋《花樣年華》與《對倒》之間的關係：「對我說，Tete-beche不僅是郵學上的名詞或寫小說的手法，它也可以是電影的語言，是光線與色彩、聲音與畫面的交錯。Tete-beche甚至可以是時間的交錯，一本一九七二年發表的小說，一部二〇〇〇年上映的電影，交錯成一個一九六〇年的故事。」

人生不就是一齣「對倒」嗎？「慈壽九分銀對倒郵票」等了七十八年等到了劉以鬯成就了小說《對倒》，現在它成了劉以鬯《對倒》的封面圖案，因為有了《對倒》，才有了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也才有了三十年後風光無限的張曼玉與梁朝偉，也才有了千萬個讀者從電影院走出，直奔書店去購買劉以鬯的小說《對倒》的動人場景。

劉以鬯，是香港現代文學史中的一個重要人物，有人說他是「香港文壇的教父」，他的小說《酒徒》被評論界稱之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

《對倒》是劉以鬯先生自己最喜歡的作品之一。但是，「三十年人家也不注意」，老人淡淡的語氣

中不無感觸。

其實小說《對倒》沒有電影《花樣年華》那樣的好運氣。

在《對倒》中國文聯版序言中，劉以鬯先生這樣說：

《對倒》於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開始在香港《星島晚報》連載，約十一萬字，是篇幅較短的長篇小說。

……

「對倒」是郵學上的名詞，譯自法文 Tete-Beche，指一正一負的雙連郵票。用一正一負的方式寫小說，會形成「雙線並行發展」的另一種「雙線格局」，這種寫法，雖然可以充分發揮對比的作用，卻不易構成吸引讀者的興味線。香港報紙的負責人多數重視經濟效益，刊登的連載小說必須有離奇曲折或纏綿悱惻的情節去吸引讀者追讀，像《對倒》這樣沒有糾葛的小說，縱有新意（至少我自己認為這是嘗試性的寫法），也不可能得到報館方面的讚許。因此，寫了一百多天（每天一千字），我將它結束了。

一九七五年，也斯約我為《四季》雜誌寫稿，我將《對倒》改寫為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對倒》在《四季》發表後，日本二松學會大學教授本橋春光將它譯成日文，收在《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中，李文靜（Nancy Li）將它譯成英文，刊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譯叢》（Renditions）第二十九-三十期。此外，香港電台電視部戲劇組將它改編為電視劇，由張少馨導演。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歌德學院院長施德立博士（Dr. Erhard Stadler）發起的（中、德文化交流研討會）曾討論《對倒》。這是短篇小說《對倒》的命運。

長篇小說《對倒》發表近二十年，一直得不到出書的機會。一九九二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首次出版。但是，「即使斷版，也不考慮再印」，這是北京出版方面的想法。因為它確實太沒有市場了。而它在香港就一直未出版過。

自二〇〇〇年六月，劉以鬯離開主辦了十五年半的《香港文學》（月刊）。

後來他將長、短篇《對倒》合在一起，加上各地學者、作家的評論，結成《對倒》香港版。

《對倒》以敘事結構形式作為題目，它描寫香港鬧市大街上一個老者滿懷憶舊情緒，一個少女滿懷浪漫的世俗理想，從街道兩端相對行走，對街頭櫥窗和風波做出或憶舊的，或浪漫的不同聯想，最終不期而遇地走進電影院鄰座和公園的同一張椅子，相互間又做着風馬牛不相及的猜測。

然而，在香港這樣一個商業氣氛濃郁，重利而輕情的都市，一部沒有故事的小說，縱使有多麼高超的技巧，藝術價值引起海內學者的如此重視，但仍是很難引起讀者的注意與興趣。

是電影《花樣年華》，將人們幾乎遺忘的《對倒》從塵封的記憶中打撈出來，讓人們重新認識劉以鬯的人生和文學價值。

電影《花樣年華》是一部壓抑激情的電影：一個已婚的男子和一個已婚的女子，生活在同一個空間和時間中，刻骨銘心而不敢放縱自己的情感，最後交叉擦身而過，留下終生不可遺忘的記憶。這種把意識流手法用於陌生人街頭對行，從而產生隔代人不同心態的強烈對比的敘事謀略，實在是匠心獨運的創造。

電影《花樣年華》獲得了巨大成功。

時間如潮水淘汰了許多沒有意義的東西，它又將一些美好的有價值的從大海深處推向岸邊，留待人們重新審視。

## 香江文壇

二〇〇一年七月，香港特區政府將大紫荊榮譽勳章頒發予香港作家聯會會長劉以鬯先生，以表彰他在中文寫作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對香港文學事業發展所作的貢獻。

香港作聯理事會為他在北角敦煌酒樓設宴恭賀，席上，劉以鬯淡然地說：「這次獲得特區政府頒發的榮譽勳章，我不能說夢想成真，因為我從來沒有夢見過要得獎，也從來沒有想過得獎。」

劉以鬯從一九四八年到香港，一個人沒有經濟背景，沒有朋友，到今天整整超過半個世紀的歲月，他一直是以報紙副刊，文學雜誌編輯和賣文為生的。從一九三六年五月發表第一部小說《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刊朱血花（旭華）編《人生畫報》第二卷第六期），到蜚聲海內外的《酒徒》、《對倒》、《打錯了》等著作。劉以鬯半個世紀中走過的人生旅程，有痛苦，——為了生存，他創作了數千萬字的娛樂他人的「通俗」小說；有歡笑——無止境地探索文學形式如何表達人類隱秘多變多元的內心世界。而這些被他稱之為「娛樂自己」的嚴肅小說，如前面提到的《酒徒》，被中國文學界譽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和《對倒》等形式特異的現代主義作品在香港發表伊始，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劉以鬯的人生也呈現出一個「對倒」的特異情景，當初為了求得自由的創作，而告別上海來到香港，最終卻困了生計，而被迫放棄辦文學刊物，為藝術而創作小說的念頭，去寫一些自己不喜歡卻為他人娛樂的東西，編一些自己並不願意看專為迎合市民階層的雜誌。當初嘔心瀝血創作的《酒徒》、《對倒》並無多少人喝彩，三十多年後，卻因了一部懷舊電影《花樣年華》而重拾原本應有的掌聲。

二〇〇二年，各地出版社爭相出版劉以鬯的著作，他的《對倒》、《打錯了》、《不是詩的詩》已

先後在香港出版。此外，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為他出版《酒徒》，列入《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北京作家出版社新出版國內版《對倒》，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劉以鬯小說自選集》，上海百家出版社即將出版劉以鬯的小說集。

從一百多年前的一張「慈壽九分銀對倒郵票」，到一九七二年劉以鬯由此啟發創作小說《對倒》；三十年後小說又因此啟發了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出生於上海，五歲移民香港的王家衛，導演了一齣萬人空巷的《花樣年華》，而電影《花樣年華》的成功，讓人們重新尋覓《對倒》的藝術價值和創作者劉以鬯先生睿智的思想，以及他對藝術不倦的探索精神，歲月導演了一齣對倒大戲，過往的辛酸，苦痛的努力，都成為今日輝煌的見證。如今，八十三歲的劉以鬯平和地在他居住的家中，不再做「娛樂他人」的無謂創作了。窗外有風、有雲，卻不關他的事。他對人談到今後的寫作計劃時，他說，一是修改舊作出書；二是雜記文壇舊事；三是寫小說與散文。

離開《香港文學》雜誌社後，劉以鬯先後在香港文匯報、大公報、明報月刊等報刊雜誌上一連發表了多篇富有創新意念的作品。

生命在於創造，在於不停息地創新。這是劉以鬯先生對文學的全方位的定義，也是他半個多世紀的實踐。

老人以淡泊的心境開始了他人生又一次創作歷程。

往事留給了他人去細細品味。而我們則順着這歲月之蒼痕，在劉以鬯的對倒時空裡去尋覓一個智者對生命與文學的詮釋。由此，讓我們進入上一個世紀，中國的東部——上海，從劉以鬯先生的出生地開始追溯一個文化人的人生旅途。

## 第二章 上海、重慶，留在記憶中的蒼茫

他們並不是相對而坐的。他們並排坐在卡位的一邊。他們猶如一對摔跤家，扭作一團。他們做他們願意做的事情，旁若無人。對於他們，餐廳的一切，除了他們兩個之外，全不存在。

——劉以鬯《對倒》

冥冥中，自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安排着一個人的一生。

那也許就是被寫在巴黎聖母教堂一側磚牆上的兩個法文字母，譯成中文的「宿命」。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農曆十一月初五）生於上海的劉以鬯祖籍浙江鎮海西管鄉貴馬四橋。原名劉同繹，字昌年，筆名除劉以鬯外，還有藍璫、葛里哥、林荷苓、太平山人等。

父親劉灝，字養如，上海中西書院畢業，曾加入同盟會，一九二四年任黃埔軍官學校英文秘書。翌年，放潮海關監督兼汕頭交涉員。抗日戰爭期間，任浙海關監督。寧波淪陷前，因病經港返滬。一九四四年秋，因病在滬逝世。

母親季素雲，上海浦東川沙人。

劉以鬯七歲進入上海閘北三育小學讀書，等到認識一些漢字之後，他就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小朋友》、商務印書館的《兒童世界》等兒童雜誌的長期訂戶。

他還喜歡集郵，這成為劉以鬯一生的愛好，也因此影響了他後來的創作選材，因郵票而寫成的長達五十七萬字的小說《郵票》，以及由郵票而啟發的小說《對倒》。

那時，他家住滬西，愛文義路上有兩家白俄開的郵票店。只有八九歲的劉以鬯常常站在櫥窗前看郵票中那繽紛的世界。



一九八五年，劉以鬯創辦《香港文學》雜誌社，任《香港文學》（月刊）主編。

母親給他的零花錢積攢多了，他也會走進去理直氣壯地對那位瘦瘦的白俄老頭說：「買郵票」。

手中只有一點點錢，白俄老板只給他「垃圾票」。

「只要印刷漂亮，我就喜歡」。

隨着集郵興趣的濃郁，劉以鬯從買散票到買成套的。

然而，父母給的零用錢畢竟有限，成套的他買不起。於是，搜集郵票成了他上學之餘最重要的事情。

母親看他如此喜歡郵票，就請木匠專門給他做了一個扁扁的木盒子，一格一格的，存放集郵簿、剪刀、鉗子。劉以鬯童年是在和平、寧靜快樂中度過。

一九三一年夏，劉以鬯以優異的成績在上海閘北小學畢業升入上海南市大同大學附屬中學。

學校在南市的南火車站附近。從他家到學校，路程相當遠，要經過公共租界、法租界，要轉三次車才能到達學校。因此，他在學校寄宿。在校除了



學習之外，他喜歡打籃球，喜歡閱讀新文學作品。周末回家的時候，母親常常陪他去上海書店集中地段四馬路棋盤街開設的有商務、中華、開明、現代等幾間著名書店。在那裡，劉以鬯購買了大量的文學書籍。對於文學的愛好，是從中學時期開始的。學校的壁報上常常見到劉以鬯的短文章。

一九三三年春，十四歲的劉以鬯參加了「無名文學會」與「狂流文藝會」。前者是葉紫發起組織的，於一九三三年春成立，葉紫任會長，陳企霞任副會長。一九三三年六月，「無名文學會」出版了《無名文藝》月刊。

葉紫組織的「無名文學會」，距今已有四十五年。劉以鬯在追憶四十五年前的舊事時說道：「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葉紫與陳企霞一再鼓勵會員們多寫，要大家將寫好的作品寄到「無名文藝」編輯部；並一再保證，編輯部同人對會員們的稿件必定優先處理。」（《葉紫與「無名文學會」》，見《劉以鬯選集》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八〇年一月初版）

劉以鬯在五十九歲的時候，追憶了生平第一次接觸文藝社團的情景，頗有一番聖潔的情懷。葉紫（一九一二到一九三九），是現代小說家，原名余昭明，又名鶴林。筆名葉子、楊鏡清、阿芷等。湖南益陽人。他主要活動於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學讀書時參加農會的宣傳工作，一九二六年，葉紫隨着家人參加湖南農民運動，一九二七年五月，長沙「馬日事變」後，葉紫的父親、叔父和二姐均被殺害，葉紫被追捕，逃離家鄉，在湘、鄂、贛、蘇等地過着流浪生活。一九三三年，葉紫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開始文學創作。他把大革命時代家鄉的事變和自身的經歷作為素材，創作小說。當時，葉紫的作品，如《豐收》和《火》，深受讀者的熱愛。魯迅曾將他的作品輯集、作序及出版，列入自己主編的「奴隸叢書」

中。但由於生活的折磨，葉紫染上嚴重的肺病，於一九三九年在湖南逝世，年僅二十七歲。由此看來，組織「無名文藝社」時，葉紫也是一位僅二十一歲的文學青年。而當年才有十四歲的劉以鬯，初次撞入文藝殿堂時，這個殿堂的「會長」是葉紫，他認為葉紫是一位「真正愛好文學的人」，在有意無意間，應該說，葉紫是劉以鬯創作生涯中接觸的第一位作家，幾十年後，劉以鬯對葉紫有很高的評價。他說：

葉紫在「無名文藝」發表《豐收》之前，也是無名的；《豐收》發表後，有名了。那時候，他不過二十一歲。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能夠寫出這樣意義深長的、有力的小說，引起廣泛的注意，是必然的。他的小說寫得好，主要因為生活經驗豐富。在《夜雨飄流的回憶》中，他說：「什麼苦都願意吃；什麼禍都不怕……。」這種倔強，使他在困難的環境中寫出了像《豐收》那樣優秀的作品。

葉紫死得太早，留給我們的作品並不多。人民文學出版社於一九五五年出版的《葉紫創作集》幾乎包括了他的全部創作。數量雖少，每一篇都結實，有分量，極富戰鬥性。《豐收》英譯本對葉紫作品說了這樣幾句中肯的評語：

「在傳達時代的脈動時，在反映當時的現實時，葉紫小說的逼真是極其可信的。」

儘管葉紫自謙「沒有技巧，沒有修詞，沒有合拍的藝術手法」，他的小說，無疑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收穫。（同上）

劉以鬯晚年對葉紫小說的評價達到如此高度，可見，他對葉紫執着的創作態度及現實主義的手法是敬佩的。他學習寫作時所接觸的第一位啟蒙者和引路人，應是葉紫。

加入了「無名文學會」，更激發了劉以鬯的創作熱情，除了編壁報外，他開始給報刊撰寫文學作品。

劉以鬯發表第一部作品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七歲，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在這一時期，國家正處在生死存亡關頭，抗日救國呼聲日盛，劉以鬯也與大多數學生一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參與罷課、示威遊行。因此，他的創作也無法脫離當時的抗戰、離亂背景。這篇題為《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的短篇小說，有他的同學華君武的三幅插圖，發表在朱血華（旭華）編的《人生畫報》上。

小說寫一個白俄女人離鄉背井流轉到上海的生活。作為一個初學寫作的中學生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顯露了它在藝術上的一些稚嫩、文字上的生澀，但從結構到立意仍是可取之處。

劉以鬯的這篇處女作，通過描寫安娜·芙洛斯基的流亡生活和特有心態，反映了一個白俄女子的遭遇和命運。安娜·芙洛斯基出身於俄國貴族之家，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她流亡中國，先後在齊齊哈爾、天津、威海衛等地做女招待、模特兒、舞女。在輾轉各地的流亡生活中，青春隨之逝去，如今，流落上海街頭，已經是「一個猶太老乞丐樣的白俄中年婦女了。」現在，沒有了青春的安娜·芙洛斯基生存現實更為殘酷，也更加尷尬。甚至「連一塊黑面包也沒法找到。」

小說真實地展示了安娜·芙洛斯基求生的掙扎和面臨的困境，而且還較為深刻地挖掘了她作為一個貴族子女的內心世界，雖然潦倒貧困，但追懷昔日家族的豪華生活，安心於依附他人的生存方式。現實與回憶形成時空對比，更顯得這位白俄貴族後裔的悲哀和不幸。

小說是從安娜的夢境描寫開始的，通過夢境展現了當年貴族生活的片斷場景，這樣的描寫不僅反映了安娜內心深處一直無法忘懷過去的貴族生活，又與她現在艱難的生存困境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為小說描寫和讀者觀察安娜·芙洛斯基提供了一個

視角來展示她的現實處境和內心世界。

當安娜·芙洛斯基從夢境回到現實以後，小說着重描寫了她在此時仍然把擺脫窮困潦倒的生存危機，寄希望於「能夠碰到一個男朋友」，以為這樣就「可以在上海享樂了。」可是，她在上海繁華街道遊蕩多時，卻並沒有碰到可以使她得到渴望的「男朋友」，倒是碰上了她們家族過去的一個傭人，這個傭人告訴她，她原來認識的一個男爵和一個騎兵上尉也在上海。於是，安娜又開始新的盤算：既然沒有碰上可以使享樂的「男朋友」也不妨去會會過去的舊朋友。

第二天，安娜特地買了鮮花去拜望那個傭人、男爵和騎兵上尉。可是，當她走到那傭人的住處，才知道傭人搶了一個女人的手鐲，逃走了；男爵的處境也並不好，何況根本不想認她；至於那位騎兵上尉，正病得奄奄一息，不久於人世了。

在藝術上，該小說值得記取的是它具有嘗試性的實驗，如對安娜的描寫：

安娜非常快活的靠着孤燈的鐵栓，右腿擱在左腿的站在土瀝青鋪道上。嘴角邊銜着強性的卷煙，眼珠不斷地躲在煙霧裡向每個行人作幻想的閉囊，而且不分國界的對每個不同男人報以沒有色彩的微笑。

用「眼珠躲在煙霧裡向每一個行人作幻想的閉囊，對男人報以沒有色彩的微笑」來描寫安娜·芙洛斯基企望找到男人的眼神和強顏歡笑的卑微表情，是非常準確而傳神地揭示了她此時此刻的複雜心態，從而反映了這個白俄女人現實的生存困擾。

由此可看出，雖然劉以鬯自己並無意識在技巧上採用什麼新的作法。但是，這種接近新感覺派的手法，以及受到穆時英小說的某些影響，是他終生以實驗小說為探索載體的一個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



幾十年後，劉以鬯在談到這篇小說時，也承認這篇小說確實受到穆時英小說的影響。穆時英三十年代在上海文壇非常活躍的時期，劉以鬯正在上海讀中學。

「寫白俄女人，無非想在小說中加一些異國情調，使小說能夠有一些新意，跳出窠臼。其實，我對白俄的認識很淺，雖然常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見到羅宋孀三與羅宋妓女，對他們的實際情況並不了解。因此，剛落筆就有一個難解的問題：主角的名字叫什麼？我不懂俄文，也沒有懂俄文的朋友，要解決這個問題，唯有到圖書館去看書，看到列夫·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暗忖：將主角喚作安娜吧！然後翻閱內文，在第七章看到另一主要人物的名字是：亞力克賽·機利諾微支·芙洛斯基，就決定將主角叫做安娜·芙洛斯基，不但不知道這種做法十分幼稚，反而以為將洋味孱雜在小說裡是很時髦且有新意的做法。」

二〇〇二年三月，劉以鬯在一個學術研討會上對自己大半生文學創作所做的回顧時，如此談到他的第一篇小說。

小說雖稚嫩，卻是劉以鬯走向創作生活的一個好的開端。

當「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劉以鬯中學畢業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主修政治學，副修歷史學。在這一期間，劉以鬯有機會廣泛閱讀了眾多的文學名著。從閱讀中國新文學作品，擴展到外國文學作品，而且，隨着他英文能力的提高，他開始閱讀一些英美文學作品的原文，從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中受到啟發。

「其中短篇小說對我的影響比較大，覺得這些短篇作品的寫法，跟中國當時一些短篇小說的寫法很不一樣，也由此我認識到什麼是好的短篇，哪些是不好的。」

「我在不同時期，喜歡不同的作家和作品。在抗戰期間，我喜歡的作家是海明威、史坦貝克，再往後我愛讀福克納和維珍尼亞·伍爾芙，有一個時期也喜歡過毛姆；還有一個美國作家薩洛揚也是我所偏愛的。事實上，就欣賞文學作品而言，我的口味比較寬廣，我喜歡現代的，也喜歡傳統的。」（見《知不可而為——劉以鬯先生談嚴肅文學》，原載香港《八方文藝叢刊》第六輯，一九八七年八月出版）

因為喜歡這些人的書，也因為買到了印刷精良的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英語本）和杜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美國三部曲，而萌生了自己辦一家出版社的願望。

讀書更激發了劉以鬯的創作慾望，課餘之際仍沒有停止創作，孤島時期，劉以鬯向上海《文匯報》的副刊《世紀風》和《大美報》的副刊《淺草》，以及《文筆》雜誌投稿，發表了作品《沙粒與羽片》（原載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上海《文匯報·世紀風》），這是一組頗有現代風格的小詩，反映了青年時期劉以鬯內心的思考和情懷。此外，還發表了十幾篇以散文、詩歌、電影的某些手法融合為一體的小說，大多是與當時的現實——反侵略，保家衛國的全民抗日有關，如《七里壘的風雨》、《羊群和疲憊的牧羊人》、《山麓的風暴》、《自由射手》等，其內容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和現實性。但因為缺乏真實的體驗，仍然是將想像轉化為現實。

（未完待續）